

二、香港選委會選舉與作為觀察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蕭督園主稿

- 香港選委會及資審會的設計，係中共以其自身政治發展經驗對香港政治社會的重新改造，看似比過去更加多元，但「愛國者治港」條件下，幾無民主派參與的空間。
- 中共企以協商選拔與投票選舉方式重塑香港政制，擺脫港英時期下的西方政治文化，重新打造香港政府，但小圈子選舉下，不公平的權力結構恐難支撐社會穩定。

(一) 前言

自 2019 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中共擔憂民主派在既有的選舉制度下，仍可能突破過去烏籠選舉的框架，遂在今年以人大通過「完善港區選制決定」（下稱「決定」），重新打造香港的選舉及政治制度。此次「決定」中最重要的就是擴大選舉委員會的影響力，未來選委會不僅決定特首的選任，更在立法會中擁有多數議員席次，成為強化香港行政主導制的重要單位。而為確保參選者的背景都符合中共「愛國者治港」原則，另由特區主要官員成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配合選委會打造雙重防火牆，依法從嚴確認選舉委員會、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但弔詭的是，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主要官員是由特首任命，卻有權核准未來哪些人可以推薦及選舉特首；此外，官員須向立法會負責，但又可以審查未來可能當選議員的選委。如此的設計顯然與過去三權相互制約的概念不同，因此吾人對選委會及資審會的理解應該看成，中共以其自身政治發展經驗對香港政治社會的重新改造。

(二) 選委會的組成與意涵

根據新一屆的選舉委員會設計，人數從過去的 1200 人提升至 1500 人，並擴增為五大界別，分別是：(一) 工商及金融界；(二) 專業界；(三) 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四) 立法會議員及地區組織代

表界；(五)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來組成。而調整後的選委會，新的第二界別接收了過去在第三界別中民主派佔有優勢的社會服務界，並縮減名額；而過去多支持民主派的醫生界與衛生界也被合併。此外，包括過去第一與第二界別中採取個人投票的科技、飲食、批發零售、體育文化出版界別，也均限縮改為團體投票；由於團體的申請與認定掌握在港府手中，顯然是為了剝奪民主派可能的競爭機會。而新界與港九兩地的區議會席次也均被取消，改由多個地區委員會代之。簡而言之，雖然新選委會在設計上，參與人數及組織依形式而言看似比過去更加多元，但在「愛國者治港」的條件下，幾乎沒有民主派參與的空間。而本次也僅有參選社福界的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及西貢區議會主席周賢明不是建制派。顯然，選委會已然成為中共挑選下，新一批政治經濟菁英的聚合地，也將成為實踐中共「良政善治」口號的執行者。

根據港府公布此次選委會選舉的結果，有 533 席當然選委，另有 603 名候選人在無競爭下自動當選，而剩下的 364 個選委席位由 412 名候選人競逐，但最後仍因有部分委員身分重疊，只選出 1488 名選委。相較於上一屆的登記選民將近 25 萬人，此次大幅縮減至 7971 人；而符合資格的選民也僅 4889 人，最終有 4389 人參與投票，投票率為 89.77%。雖然港府官員表示，投票率接近九成，部分界別投票率更高達百分百，這樣的高投票率顯示新選舉制度受到高度的支持。但綜觀此次選委會選舉，不僅難以符合特首林鄭月娥所表述的「均衡參與和具廣泛代表性」；上千位選委當選人在選舉前就已然篤定當選，雖展示了何謂完美選舉，卻很難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衛所說的，非「小圈子選舉」的香港民主制度相連結。不論是個人參選資格被剝奪，亦或是代表性團體被矮化，都難以讓人認同，而如今選委會選舉由公開競爭變成組織內協商，其實彰顯了「一國兩制 2.0」的內涵。

眾所皆知，中共在 2020 年先是凍結立法會選舉，而後以完善「選舉制度」進行政治制度的翻轉，雖是以糾正過往香港民粹傾向的政治發展為名義，但實質上卻是戮力於香港發展一套具有中國特色、選舉與協商混合的新政治制度。尤以中共認為香港近年來屢屢爆發社會衝突的深層次因素，即在於香港的代議制度難以擺脫特定財團及政治勢

力的操控，而年輕世代期待以雙普選來重新分配資源，不僅可能徒具民主形式卻無法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外，還將導致國家安全的憂慮。回顧今年初，前特首梁振英拋出在「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中均清楚列明特首可由協商產生的理據，即已讓各界嗅到中共有意改變政制的端倪。而習近平今年七一講話，再次強調黨的領導、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及不接受西方「教師爺」般的說教。可以預期，中共以協商選拔與投票選舉兩種方式重塑香港的政制後，期待的是擺脫過去港英時期留下的西方政治文化，試圖以混和體制重新打造有效能的香港政府，並以未來在經濟與社會上發展的成功模樣，建構其合法性並得到各界的認同。

就香港各界反應來看，對選委會選舉的態度可以分成幾類來觀察：

第一，就民主派而言，普遍認為中共的做法僅是為了防止奪權就封殺民主，而如今在中共以國安法相繼抓捕民主派人士、打擊公民社會的情勢下，顯然也凸顯中共無意也無須，再實現基本法中曾經應允的「循序漸進達至雙普選的政制目標」，未來香港也難有民主派發展的空間與餘地。

第二，是離開泛民自許為中間派的人物，如湯家驊與狄志遠。他們雖早已不被泛民視為同路人，但中共卻認為他們仍具有代表民主派的色彩，容許其成為選委。這派人士認為，中共以選委會重塑政治制度及規矩，一來是因為警惕本土自決思潮到擔憂顏色革命威脅，因此需要壓縮民主發展；其次是，香港爭取民主的進程異化為「反中」，迫使中共收緊權力；最後是，香港的民生及社會矛盾已接近崩解點，尤其在疫情下港人對未來深具無力感，對港府更無信心，因此期待中共可以出手導正，以「解決社會民生議題」作為香港的發展核心。

第三，是工商界的人士，此次中共修改選制，工商界明白矛頭對著自己，不論是財團或家族被限制參與選委會的人數，亦或是被稀釋的參政空間，未來對香港政策的影響力都將明顯下滑，與北京議價的空間也更加稀薄。僅能在中共的新方針下，一方面解決香港居屋問題、完善共同富裕目標，另一方面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協助發展前海

特區，為中港的長期繁榮做出積極貢獻。

第四，建制派中的親共人士顯然高度支持選委會，這些由中共扶持的各式組織團體，過去因為「新香港人」身分難以取得選票的認同。但未來將堂而皇之主導香港的政制運作，成為貫徹中共意志的代表，完善「愛國者治港」的政治使命。

(三) 結論

從去年「港版國安法」到今年的「決定」，中共落實了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並逐步以「有機結合」的策略重構香港的政治制度。隨著行政權及立法權皆掌握在中共手上後，顯然過去香港的高度自治也隨之遠去。雖然當前中共傾向以經濟利得來吸納香港社會對政治的不滿，但不應忽視的是，不公平的權力結構並不足以支撐社會穩定，尤其是過去已經被視為是小圈子選舉或是烏籠選舉的制度，如今更是成為「愛國者」的新世界。新的權力結構必然又形成新的改革阻力，沒有透明公開的民主監督機制，即使新選制下由愛國者主導，年底即將進行立法會選舉、明年進行特首選舉，香港是否就能否極泰來，仍待檢驗。或許過去一國兩制模範生的澳門經驗，就是未來香港的模樣。